

中国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其需求满足方式的因索分析 ——来自核心家人构成的影响

郭志刚 刘 鹏

[摘 要] 尽管从中国的文化传统、法律规定和老年人自身的养老愿望来看,由核心家人(配偶及子女)来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是最理想的养老方式,但由于人口流动增强和家庭规模萎缩使得核心家人难以全部承担沉重的养老负担。文章就老年人的需求是否得到满足及由谁满足会直接影响到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这一问题,对 2002 年中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跟踪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由核心家人来提供老年人在居住、生病照顾和情感慰藉等方面的需求是最令老年人满意的。在需求满足方面,经济供养主要依靠儿子,而共同居住、生病照顾和情感慰藉上则主要是配偶的作用,再加上来自儿子、女儿必不可少的辅助作用。

[关键词] 老年人;需求;生活满意度;核心家人

[中图分类号] C91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08X(2007)03-0071-10

一、研究背景

中国的养老是以家庭养老为基础的。从社会发展来看,家庭养老不仅体现了代际之间在经济和生活上的互惠互助,而且体现了双方在精神上的互相慰藉。到目前为止,各级政府通过依靠和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采取了多种养老方式,以满足老年人的基本需求。但是,一些老年人对自己的养老并不满意。其中比较普遍的原因包括:家庭养老的观念淡化;“父母在,不远游”的束缚已被彻底打破;高龄老人越来越多,空巢老人越来越多,老年家庭也越来越多;农村养老保障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农村集体经济基础薄弱,拿不出较多资金来解决老年人的生活保障问题;老年人的家庭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传统的家庭养老已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些学者利用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 1992 年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大多数老年人对生活现状表示满意,经济收入、孤独感、健康自评和婚姻状况是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评价的最主要因素,改善老年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1]。桂世勋(2001)、黄润龙(2002)等也进行了相关的研究^[2-3]。

在经济供养方面,有的学者发现子女对父母的经济资助并不随子女数的增加而增加^[4];一些学者验证了这一观点,并进一步提出了“老人经济供给‘填补’理论”^[5]。随后又有学者利用相同数据重新检验了这一结论,并发现了上述结果其实主要反映了“年轻”老年人的状况,而更老的老年人则反映出完全不同的情况^[6]。

在共同居住方面,有的学者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子女数从无到有具有突出的门槛效应,但后续

[收稿日期] 2007-07-16

[基金项目] 本研究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家庭代际关系的人口社会学研究”(05JJD840002)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老年人口家庭、健康与照料需求成本研究”(70533010)的资助,在此鸣谢。

[作者简介] 郭志刚(1954—),男,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教授,邮编:100871;

刘 鹏,男,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烟草事业部经理。

递增的影响并不显著,并且高龄老人对子女的依赖存在很强的性别偏好^[7]。张文娟等(2004)的研究也表明老年人在居住安排上表现出对儿子的强烈偏好^[8]。杜鹏(1999)认为,虽然中国家庭总体上正趋于核心化,但对于老年人而言三代家庭仍然是最主要的居住方式,而且老年人年龄越高,其居住于三代户的比例越高^[9]。国外经典的老年学理论认为现代化进程导致了家庭结构的变化,为老年家庭成员带来可悲的后果^[10]。Goode(1970)指出,社会现代化进程与经济发展导致家庭规模减小,核心家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老年人可获得的社会资源减少^[11]。另外,经济发展带来的劳动力外流削弱了家庭赡养老年人的能力,主干家庭取代作为家庭养老基础的联合大家庭^[12],已经成为最常见的家庭结构^[13]。

随着社会变迁,情感支持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独立于物质供养而日趋重要的问题。有的学者提出了“精神赡养”的概念^[14]。

在生病照顾方面,笔者认为仅仅用一般健康人的标准来评价所有人的健康状况是不妥当的,这会抹煞各个人群(如不同年龄)的多样性和异质性。例如,有人虽然带病或身有残疾,但他已经适应或学会了带病生活,所以其自身的评价往往偏于良好。有学者发现高龄老人在户居方式和经济供养上主要依赖儿子,但女儿在生活照顾上显得更为重要,有女儿的高龄老人往往对生活和健康状况的评价更为满意^[15]。郑真真等认为改善高龄老人生活质量的重点应当是加强社会和家庭的人文支持和关怀力度^[16]。Chen A. J. (1989)发现东南亚地区的大多数老年人已经慢慢从传统的全面依靠家庭向依靠国家、当地政府、社会等非家庭力量过渡^[17];Lowe V. H. (1980)的研究发现随着社会和政府力量对家庭养老重负的分担,香港以及正进行着类似变革的其他地区都有可能导致生育率的大幅下降^[18]。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框架

本次研究的数据来自于2002年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跟踪调查。该调查是北京大学老龄健康与家庭研究中心组织的跟踪调查,首次调查于1998年在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开展^[19]。在1998年的基础调查及2000年的跟踪调查中,只调查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但是从2002年开始,调查的老年人范围扩大到60岁及以上。2002年调查样本规模为16064名老年人。

研究框架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是老年人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包括经济供养、共同居住、情感支持和生病照顾这四个方面的满足程度。第二是现今中国社会的老年人在养老过程中对家人尤其是核心家人存在偏好和依赖。第三则是在社会变迁和国家政策的影响下,家庭已无力独立承担养老的重任。

在这种框架下,为了保证老年人有一个愉快的晚年(即生活状况自评好),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做出具体的研究:老年人的各种需求中到底有哪些必须通过核心家人提供,有哪些需求满足可以转移到社会或社区,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还受到哪些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核心家人的结构对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到底有怎样的影响,这些便构成了本文将要讨论的问题。

本文在经济供养、共同居住、情感慰藉和生病照顾这四个方面均采取逐步深入的方式来进行研究,这里仅以经济供养为例加以说明。首先,我们分析老年人钱是否够用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然后,进一步对那些不能自我经济支持的老人进行具体研究,探讨他们是否由家人供养所导致的生活满意度差别。如果结果证明由家人供养对老人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效应,则进一步探讨在那些由家人供养的老人中,是否由核心家人供养对老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在所有的阶段性研究模型中,老年人的核心家人构成(包括是否有配偶以及子女结构^①)、社会经济变量(包括老人的年龄、性别、居住地点、民族、职业、上学年数等)和健康状况自评都作为模型解释变量,其中后两者作为控制变量,而核心家人的结构则是分析时主要关注的因素。

根据以往文献理论和现实观察,模型所要检验的假设如下:

(1) 经济供养方面是否得到满足会影响老年人的整体生活满意度,而具体的满足方式对于老年人来说并不重要,子女结构和配偶对经济供养没有明显影响。

(2) 与经济供养类似,生病是否得到照顾会影响满意度,而由谁照顾并不重要,有无同住配偶、有无女儿对生病照顾有影响,有无儿子对之无影响。

(3) 在共同居住方面,有其他人同住、尤其是与核心家人同住会显著提高老年人的满意度,有无配偶、儿子对共同居住有影响,而无女儿对之无影响。

(4) 情感慰藉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很重要,来自家人或熟人的情感慰藉更为重要,核心家人结构对情感慰藉有显著影响。

(5) 老年人偏好的需求满足的优先级为:由核心家人满足>由其他家人满足>由外人满足。

(6) 核心家人的构成(包括配偶、子女结构)对老年人的需求满足方式会有影响。

检验上述各假设的变量模型用图1和图2来示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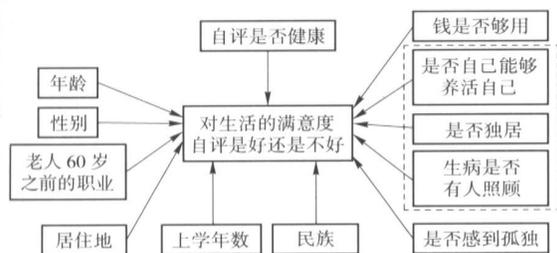


图1 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的模型^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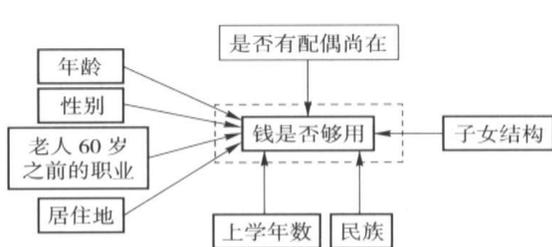


图2 需求满足方式影响的模型^③

三、需求满足方式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本节侧重于考察老年人需求是否满足和由谁来满足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探讨老年人需求满足方式的理想模式。

(一) 老年人需求是否得到满足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本部分主要讨论会影响到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在需求方面的因素。我们首先将各自变量加入模型,重点考察在经济供养、共同居住和生病(生活)照顾等需求满足方面的差别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由于模型纳入变量较多,使用 Logistic 回归的筛选方法精简,最终结果见表1。表1的分析结果表明,显著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因素及其具体影响方式包括:

(1)“钱是否够用”的回归结果表明,具有足够经济供养的老年人对生活的满意度自评明显高于那些生活供养不够用的老年人,钱够用的老人相对钱不够用老人的优势比(odds ratio, 即表中的 exp(B)值)为 3.74 倍。

① 本研究本来包括了子女数量的分析,由于篇幅所限此部分内容略去。

② 虚线框表示在不同分析中将被替换的内容。

③ 中间的虚线框表示不同分析中将被替换的内容。

(2)独居对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非独居(与家人共住或住养老院)老人中满意度发生比(odds)是独居老人的 1.65 倍。

(3)生病时有人照顾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明显高于那些无人照顾的老年人,前者的生活满意度发生比是后者的 2.10 倍。

(4)情感上不孤独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明显高于那些感到孤独的老年人,前者的生活满意度发生比是后者的 1.58 倍。

(5)自评健康的老人比自评不健康的老人对生活满意得多,健康老人相对不健康老人的满意度优势比高达 4.65 倍,可见健康对于老年人满意地度过晚年生活有多么重要。

(6)在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变量中,“老人 60 岁以前的职业”、“居住地”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干部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农民老人的满意度,其优势比为 1.62 倍;但是工人与农民没有显著差异。以居住在农村为参照,居住在城市的老年人明显更为满意,但是居住于城镇的老年人与农村老年人没有显著差异。

(7)“性别”和“年龄”这两个人口学变量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也存在显著影响。在控制其他变量以后,男性的满意度低于女性,男性中满意发生比仅达到女性相应水平的 79%。

结果表明,年龄越大,满意度越高。这一结果其实与高龄老人家庭和社会地位下降的理论并不一致。这种结果的产生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选择效应,即长寿的老年人一般都是对生活比较满意的老年人,他们要么生活条件较好,要么心态较好,因此导致高龄老人反而对生活更加满意;第二是高龄老人以前经历过较多的苦难,反而更加豁达,更加容易满足。

(8)对这些显著变量的标准化系数(Beta)绝对值的比较表明,它们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相对影响作用从大到小依次排列为:是否健康>钱是否够用>干部与农民的差别>城市与农村的差别>是否感到孤独>年龄>是否独居>性别>生病是否有人照顾。

(二)老年人需求是否由家人提供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在这一部分,我们试图探索在上一模型中统计性显著的变量背后,是否还蕴含有老年人的更深层次需求满足方式。

表 1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结果

	B	Beta ^①	Sig.	Exp(B)
钱够用	1.319	0.288	0.000	3.741
自己能供养自己	-0.106	-0.026	0.084	0.908
非独居	0.501	0.094	0.000	1.651
生病有人照顾	0.742	0.058	0.000	2.101
不感到孤独	0.455	0.118	0.000	1.577
健康自评好	1.536	0.423	0.000	4.646
上学年数	0.014	0.027	0.052	1.015
年龄	0.015	0.097	0.000	1.015
男性	-0.239	-0.065	0.000	0.788
居住地				
城市	0.315	0.144	0.000	1.371
城镇	0.039	0.018	0.424	1.043
老人 60 岁之前的职业				
干部	0.479	0.172	0.000	1.615
工人	0.081	0.029	0.066	1.084

注: a. 纳入最初模型的变量还包括民族,但在筛选中已被排除。

b. 回归模型的因变量为生活状况自评为不满意,回归卡方值为 3 477.786,显著度为 0.000,案例数为 14 259。

① Beta 值为标准化回归系数,可以用于比较各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相对影响程度(参见郭志刚,1999:第 202 页)。

虽然在样本规模上与上个模型分析的差别不大,但本次分析在结果(表2)方面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尤其体现在我们主要关注的三个需求满足方式的变量上。具体结果解释如下:在我们考察的三个变量中,“生病时有人照顾的老人是否由家人照顾”由于显著水平较低而被排除出最终模型。另外,对那些经济上不能自我支持的老年人来说,其经济来源无论是来自于家人还是非家人(包括朋友、邻居、社会和政府等等)都无所谓,这种经济来源的途径差异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并没有显著影响。

唯一取得统计性显著的变量是“非独居的老人是否与家人同住”,但其结果出人意料,非独居的老人中与家人同住者会明显降低生活满意度,这似乎显示出老年人更喜欢养老院等与非家人共同居住的方式,与家人同住的老人中满意发生比仅为住养老院老人的0.55倍。这一结果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思考,我们考虑到“共同居住”与“生病照顾”之间可能存在共线性问题,因为将两者分别纳入模型中时,二者分别都能得到较高统计显著度(0.000)。并且,当“生病时有人照顾的老人是否由家人照顾”与“不能自养的老人是否由家人供养”同时纳入模型时,前者也会变得不显著,说明“经济供养”与“生病照顾”也可能存在一定相关。然而,变量“不能自养的老人是否由家人供养”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始终不显著。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生病时有人照顾的老人是否由家人照顾”、“不能自养的老人是否由家人供养”和“非独居的老人是否与家人同住”三个变量之间存在共线性,因此导致第一个变量只有单独纳入模型才会显著。其中,“不能自养的老人是否由家人供养”则始终不能显著,这说明它的独立解释能力相对最小。而“非独居的老人是否与家人同住”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独立影响相对最强,即使在其他相关自变量也纳入模型时,依然显著。

另一个值得深究的结果是在这些非独居的老人中,住养老院的老年人明显比与家人共住的满意度要高,也是一个不太好理解的现象。易松国和鄢盛明(2006)也曾在另外的调查分析中发现,养老院老人满意度高于居家老人,他们猜测这是因为养老院接受调查的人大都是身体较好的人,而居家老人则包括各种身体状况的受访者^[20]。而我们将本文数据中那些住养老院的老年人选出来进一步分析的结果表明,住养老院的老人一般都是农民和工人、年龄偏大、没上过学、无子女或少子女、同时也没有配偶的孤寡老人,他们一般都属于社会中的底层弱势群体,因此无论从心态还是从实际条件来看都是处于易于满足的群体,所以当他们的住进养老院时,就会觉得生活很好了,因此生活满意度较高。这可能是住养老院的老人满意度比居家老人甚至比与家人共住的老人更高的主要原因。

(三)核心家人与非核心家人的作用差别

下面这一模型只对那些与家人同住、由家庭供养、照料的老年人进行分析,以讨论由一般家人

表2 老年需求满足方式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B	Beta	Sig.	Exp(B)
钱够用	1.350	0.294	0.000	3.856
不能自养的老人由家人供养	0.194	0.031	0.073	1.214
非独居的老人与家人同住	-0.597	-0.074	0.000	0.55
不感到孤独	0.505	0.131	0.000	1.657
健康自评好	1.567	0.432	0.000	4.792
年龄	0.016	0.103	0.000	1.016
男性	-0.209	-0.057	0.000	0.812
居住地				
城市	0.279	0.128	0.000	1.321
城镇	-0.038	-0.017	0.535	0.963

注: a. 初始模型中还包括变量: 老人60岁之前的职业、上学年数、有人照顾的老人是否由家人照顾、民族,但依次在筛选中被淘汰。

b. 回归模型的因变量为生活状况自评为不满意,回归卡方值为1988.083,显著度为0.000,案例数为8694。

与核心家人来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在影响其生活满意度上是否存在差异。分析结果表明,虽然在同住、照料、供养三个方面是否由核心家人来满足需求导致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存在一定差异,但这种差异仅存在于样本当中,不能推断到总体(表3)。考虑到三者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我们将三个变量分别再纳入到表3模型进行单独分析,并将三个结果汇总到表4中。

如表4所示,除了变量“由家人供养的老人是否由核心家人供养”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之外,其他两个变量均显著,而且他们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力从大到小依次为“由家人照顾的老人由核心家人照顾”>“与家人同住的老人与核心家人同住”>“由家人供养的老人由核心家人供养”,可见生病照顾的满足方式是老年人最为重视的,其次是共同居住的满足方式,而经济供养的满足方式是老年人最不重视的,即究竟由谁来满足老年人的经济需求并不重要。

表3 生活状况自评与其影响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结果

	B	Beta	Sig.	Exp(B)		B	Beta	Sig.	Exp(B)
钱够用	1.376	0.300	0.000	3.959	男性	-0.199	-0.054	0.000	0.819
不感到孤独	0.478	0.124	0.000	1.614	居住地			0.008	
健康自评好	1.578	0.435	0.000	4.847	城市	0.23	0.105	0.006	1.258
年龄	0.016	0.103	0.000	1.016	城镇	-0.059	-0.027	0.364	0.943

注: a. 初始模型的变量还包括: 与家人同住的老人是否与核心家人同住, 上学年数, 由家人供养的老人是否由核心家人供养, 老人60岁之前的职业, 由家人照顾的老人是否由核心家人照顾和民族。但在筛选中依次淘汰。

b. 回归模型的因变量为生活状况自评不好, 回归卡方值为1767.108, 显著度为0.000, 案例数为7733。

表4 三个自变量分别再加入表3模型后各自结果的汇总表

	B	Beta	Sig.	Exp(B)
由家人照顾的老人由核心家人照顾	0.213	0.034	0.002	1.260
与家人同住的老人与核心家人同住	0.193	0.025	0.032	1.213
由家人供养的老人由核心家人供养	0.145	0.019	0.072	1.156

而在表3模型中分别尝试分别加入表4中3个自变量的时候,原来表3中那些自变量就作为控制变量,其中的“钱是否够用”、“是否感到孤独”和“自评是否健康”仍然始终都能显著。

四、核心家人构成对老年人需求满足的影响

这里所指的核心家人构成包括两个变量,即配偶是否尚在和存活子女构成,其中子女构成包括无儿无女、仅有女儿、仅有儿子和儿女双全四个类别。本节中主要考察这两个变量是如何对老年人各方面需求的满足及其满足方式产生影响,从而间接地影响到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模型中的控制变量主要是社会人口变量,包括上学年数、年龄、性别、民族、居住地和老人60岁之前的职业。

(一)经济供养

模型分析的因变量是老年人在钱上是否够用,以反映老年人的经济供养状况,考察核心家人构成在经济供养方面是否得到满足的影响。

分析结果表明(表5),是否有配偶尚在对老年人的钱是否够用并无显著影响,因此这个解释变量在取得最终模型前已经被淘汰。

表 5 核心家庭构成对经济供养的影响

	B	Beta	Sig.	Exp(B)		B	Beta	Sig.	Exp(B)
子女结构					老人 60 岁之前的职业				
无儿无女	-0.587	-0.347	0.000	0.556	干部	0.855	0.306	0.000	2.352
仅有女儿	-0.179	-0.106	0.005	0.836	工人	0.064	0.023	0.154	1.066
仅有儿子	-0.055	-0.033	0.364	0.946	上学年数	0.064	0.123	0.000	1.066
居住地					年龄	0.006	0.039	0.000	1.006
城市	0.417	0.191	0.000	1.517	汉族	0.429	0.054	0.000	1.536
城镇	0.206	0.094	0.000	1.229					

注: a. 纳入初始模型的变量本来还包括是否有配偶尚在和性别, 但它们依次被淘汰。

b. 回归模型的因变量为钱不够用, 回归卡方值为 482.212, 显著度为 0.000, 案例数为 15928。

在儿女结构方面, 以儿女双全为参照类, 则无儿无女的老人在可用钱数上明显比儿女双全的老人少, 即无儿无女的老人中钱足够用的发生比仅为儿女双全老人相应水平的 0.556 倍。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仅有女儿的老人中, 这些老人中钱够用的发生比仅为儿女双全老人相应水平的 0.836 倍。仅有儿子这个类别的钱够用的发生比虽然略低于儿女双全的老人, 但这种差别并不显著, 因而不能推断总体。可见, 现今社会中儿子在家庭经济供养上的贡献仍是极为重要的。

(二) 共同居住

以下的分析是对所有老人来分析核心家人构成在共居与独居发生比上的影响, 因变量为是否共居, 参考类是独居。

这一分析的结果表明(表 6), 配偶的作用非常显著, 有配偶的老年人中非独居相对于独居的发生比是无配偶老人的 23.7 倍, 可见配偶在增加老人共居方面的重大作用, 同时也表明有配偶的老人很少有与配偶分开居住的。

在儿女结构的影响方面, 以儿女双全为参照, 仅有女儿这一类与之存在显著差异, 且出乎意料的是仅有女儿也可以明显增强老人共居的可能性; 而仅有儿子尽管也有促进作用, 但与儿女双全的统计性却并不显著。这种结果既可能是在表明女儿在增强老人共居可能性方面的作用大于儿子, 但也有另一种可能解释, 即老人如果仅有女儿也许增强了住养老院的倾向。于是, 我们对那些共居的人做了进一步的分析。结果表明, 并非是仅有女儿的老人中有很大大一部分住到了养老院, 他们的确仍然是与家人同住。因此, 仅有女儿的确是在减少老人独居的可能性, 并且仅有女儿的作用确实还高于儿女双全, 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 当还有儿子的条件下, 女儿就不会主动承担与老年人共住的责任, 但在没有儿子的条件下, 女儿其实会更主动地与老人同住。

表 6 共同居住的影响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表

	B	Beta	Sig.	Exp(B)		B	Beta	Sig.	Exp(B)
有配偶尚在	3.166	0.809	0.000	23.710	居住地				
子女结构					城市	0.268	0.123	0.000	1.307
无儿无女	-0.135	-0.080	0.057	0.873	城镇	0.97	0.444	0.109	1.102
仅有女儿	0.380	0.225	0.000	1.462	年龄	0.037	0.239	0.000	1.038
仅有儿子	0.064	0.039	0.360	1.066	男性	-0.189	-0.052	0.000	0.827
					汉族	-0.411	-0.052	0.000	0.663

注: a. 纳入初始模型的变量还包括上学年数和老人 60 岁之前的职业, 但筛选中被淘汰。

b. 回归模型的因变量为老人是否与所有类型其他人共居, 回归卡方值为 1189.463, 显著度为 0.000, 案例数为 13790。

(三)生病照顾

在下面的模型中(表7),研究对象是所有老人,因变量是在老人生病时是否有人照顾。

我们首先来看配偶对老年人生病是否有人照顾的影响。结果表明:有配偶在会显著提高生病老人有人照顾的可能性。有配偶老人的有人照顾发生比是无配偶老人相同指标值的近6倍,配偶的重要作用再一次得到体现。

在儿女结构方面,虽然其他三种类别相对儿女双全类在老人生病有人照顾的水平上有所降低,但其中只有无儿无女才与儿女双全差异取得统计性显著,且无儿无女老人的有人照顾发生比只有儿女双全老人的31.8%。仅有女儿和仅有儿子与儿女双全相比,差异并不显著,因而并没有为女儿在生病照顾中发挥着比儿子更重要的作用的观点提供有力的佐证。

表7 生病照顾的影响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表

	B	Beta	Sig.	Exp(B)		B	Beta	Sig.	Exp(B)
有配偶尚在	1.772	0.453	0.000	5.881	仅有儿子	-0.223	-0.132	0.192	0.813
子女结构					年龄	0.067	0.432	0.000	1.078
无儿无女	-1.146	-0.678	0.000	0.318	男性	-0.244	-0.067	0.036	0.784
仅有女儿	-0.201	-0.118	0.302	0.818	汉族	-0.573	-0.072	0.066	0.564

注: a. 纳入初始模型的变量还包括上学年数、居住地和老人60岁之前的职业,但依次被淘汰。

b. 回归模型的因变量为老人生病时是否有人照顾,回归卡方值为265.736,显著度为0.000,案例数为15915。

(四)情感慰藉

在对情感慰藉的模型中,研究对象是所有老人,因变量是老人是否感到孤独。

表8分析结果表明,配偶在老年人的情感慰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配偶的老人明显比无配偶的老人更少地感到孤独。具体地说,有配偶的老人中不感到孤独的发生比是无配偶老人中的2.64倍,可见配偶在消除老年人孤独感方面的重要作用。

儿女结构方面,虽然样本显示其他三类老人均比儿女双全的老人更多地感到孤独,但除了无儿无女的老人与儿女双全的老人有显著差别外,仅有女儿和仅有儿子的老人的差别均未取得统计性显著,可见儿子和女儿在老年人的情感慰藉方面的作用大体类似。

表8 情感慰藉的影响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表

	B	Beta	Sig.	Exp(B)		B	Beta	Sig.	Exp(B)
有配偶尚在	0.972	0.248	0.000	2.643	居住地				
子女结构					城市	0.413	0.189	0.000	1.511
无儿无女	-0.159	-0.094	0.006	0.853	城镇	0.089	0.041	0.048	1.093
仅有女儿	-0.074	-0.044	0.194	0.929	上学年数	0.034	0.066	0.000	1.035
仅有儿子	-0.094	-0.056	0.078	0.911					

注: a. 纳入初始模型的变量还包括年龄、性别、老人60岁之前的职业、民族,但已经被淘汰。

b. 回归模型的因变量为老人是否感到孤独,回归卡方值为848.032,显著度为0.000,案例数为14308。

五、小结

通过前面各模型分析以及相关的进一步讨论,本文分析结果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 钱是否够用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但是对于经济上得到满足的老年人来说,

经济供养的具体来源并不是他们关心的重点,无论是自己挣得、政府社会提供还是核心家人或其他家人供给都不能明显地影响到他们总的生活满意度。

2. 居住方式(即与人共居或独居)显著地影响了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独居会大大降低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而与核心家人共住的老人比那些仅与其他家人共住的老年人对生活更加满意。

3. 生病时是否有人照顾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重要影响。有人照顾比无人照顾的老年人对生活更加满意。并且,生病时由家人照顾会明显促进老年人对生活的满意度,生病时由核心家人照顾还可以进一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4. 是否孤独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重大,因此当前消除老年人的孤独感是增加其生活满意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根据数据分析结果的比较,可以得到四种基本需求的满足在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方面的作用大小的排序依次为:情感慰藉>共同居住>生病照顾>经济供养。

配偶在满足老年人各个非经济方面的需求时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存活儿女结构的影响现在主要体现在无儿无女与儿女双全的差异,而子女性别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差别在减小。儿女双全的老年人无论在哪个需求方面的满足都是四种儿女结构类型中最好的,如果再加上有配偶的话,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就基本满意了,而无儿无女的老人一般总是处于最差的状态。

当前老年人的基本需求满足方式可以概括为:经济供养上主要依靠儿子,而共同居住、生病照顾和情感慰藉上则主要是配偶的作用,再加上儿子、女儿的辅助。

针对上述分析结果中反映出的社会现状,我们认为在赡养老人的全社会分工中,政府和社会方面的工作应主要集中在维护和发扬家庭养老的传统,主要关注那些丧偶和无儿无女的老年人,同时为其他有困难的家庭提供帮助。这种外部支持主要是在经济帮助方面。而在居住方面,一方面适当扩大养老院等养老场所的规模,同时应继续倡导和鼓励子女与老年人共同居住,承担更多的日常照料和感情慰藉的责任。

[参考文献]

- [1] 齐敏. 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老年人生活状况和生活质量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2] 桂世勋. 中国高龄老年人口生活质量研究[J]. 南方人口, 2001, (4): 1-8.
- [3] 黄润龙, 牛飏. 高龄老人的生活质量差异及成因[J]. 人口与经济, 2002, (10): 129-132.
- [4] 夏传玲, 麻凤利. 子女数对家庭养老功能的影响[J]. 人口研究, 1995, (1).
- [5] 桂世勋, 倪波. 老人经济供给“填补”理论研究[J]. 人口研究, 1995, 11(6): 1-6.
- [6] 郭志刚, 张恺悌. 对子女数在老年人家庭供养中作用的再检验——兼评老年经济供给“填补”理论[J]. 人口研究, 1996 (3): 7-15.
- [7] 郭志刚. 中国高龄老人的居住方式及其影响因素[J]. 人口研究, 2002 1: 37-42.
- [8] 张文娟, 李树苗. 代际支持对高龄老人身心健康状况的影响研究[J]. 中国人口研究, 2004, (增刊): 37-42.
- [9] 杜鹏. 中国老年人居住方式变化的队列分析[J]. 中国人口科学, 1999 (3): 53-58.
- [10] Cogwill P. Aging and Modernization: A Revision of theory[M] //J. Gubrium (Ed.). *Later Life: Community and Environmental Polici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74: 123-146.
- [11] Goode, W. J. *World Revolution and Family Patterns*[M]. New York: Free Press 1970.
- [12] Yuan, F. The Status and Role of the Chinese Elderly in Families and Society[M] //J. H. Schulz & D. Davis-Friedmann (Eds.). *Aging China: Family, Economics, and Government Policies in Transition*. The Geront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987: 36-46.
- [13] Wu C. P. *The Aging of Population in China*[M]. Malta: Union Print, 1991.
- [14] 穆光宗. 老龄人口的精神赡养问题[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4, (4): 124-129.

- [15] 陈卫, 杜夏. 中国高龄老人养老与生活状况的影响因素——对子女数量和性别作用的检验[J]. 中国人口科学, 2002, (6): 49—55.
- [16] 郑真真. 高龄老人自我状况主观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分析[Q] //赵宝华主编. 提高老年生活质量对策研究报告. 北京: 华龄出版社, 2002: 84—92.
- [17] Chen A. J., Jones G., Domingo L., Pitaktepsombati P., Sigit H., Yatim M. B. *Aging in ASEAN: Its Socio-Economic Consequences*[M].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9. xvii, 117.
- [18] Lowe, V. H. *Family Structure and Fertility in Hong Kong*[M].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80: 192.
- [19] 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研究课题组. 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调查数据集(1998)[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20] 易松国, 鄢盛明. 养老院老人与居家老人健康状况比较分析[J]. 中国人口科学, 2006 (3): 73—79.
- [21] 郭志刚主编. 社会统计分析方法——SPSS 软件应用[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Factors in Determining Ways of Meeting Demands of China's Elderly and Their Satisfaction

——Impact from the Composition of Core Family Members

Guo Zhigang, Liu Peng

Abstract Although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legal rules and the own preference of the elderly all indicate that best providers to meet the demands of the elderly are their core members of the family, but the increasing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the shrinking family size make it less possible for core family members to take on the whole support burden. With data of Healthy Longevity Survey of China Elderly in 2002, this paper testified whether the demands of the elderly are met and the way to be met will directly influence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The results turned out that it is the best way to improve the living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that the core family members co-reside with the elderly and provide daily care and emotional support.

Key words The elderly; Demand; Living satisfaction; Core family members

(责任编辑: 连丽霞)